

从三原马理看明代关学思想特征^{*}

◎ 高华夏 许 宁

内容提要 三原学派马理是与吕柟齐名的关中理学家。从黄宗羲《明儒学案·三原学案》按语之歧解出发,通过三原学派与河东学派关系的讨论,展现出明代关学多元发展的总特征。马理思想对朱子学持总体接受与部分修正的态度,对阳明学总体上批评,但学理上又具有较强一致性,体现了三原学派会通朱王的思想特征。马理的本体思考、礼学实践与事功之学对张载思想均有新的体认与发展,既集中体现了关学思想特征,又是明代理学在关中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 三原学派 马理 明代关学 张载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7-0018-07

DOI:10.15895/j.cnki.rwzz.2016.07.003

学界对关学概念的界定不甚相同,^①这涉及对关学特征的具体把握,以赵馥洁概括的“(一)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二)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三)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四)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五)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六)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②为代表,大体勾勒出八百余年关学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但是,关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对关学思想特征的准确把握还须建立在更加具体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明代中期,以马理、吕柟等为代表的关中理学名家互有学术往来,对朱子学、阳明学均有不同程度的吸收,同时对关学宗主张载的思想有所继承发挥,共同把明代关学推进到新的高度,时称“关学中兴”。

马理(1474-1556年),字伯循,号谿田,陕西三原人,《明史·儒林门》有传,冯从吾《关学编》中有详细介绍,黄宗羲《明儒学案》列马理入“三原学案”,熊赐履《学统》入“附统四十二卷”。马理著作颇丰,现有《谿田文集》《周易赞义》存世,可基本展

现其思想面貌。作为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马理的思想既独具特色,又体现出明代关学发展的一般特征。本文拟通过对三原学派马理思想的个案研究,提炼出明代关学思想特征,以期进一步深化对关学的认识。

^{*}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马理关学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2014C10)

^① 有较早的张岱年、赵吉惠地域指向与学承指向的关学广狭二义说,侯外庐、龚杰“上无师承,下无继传”说,陈俊民纳入历史辩证法的张载创派、关学洛学化、明代关学中兴、清初二曲集大成说。近有刘学智以学理特征为依据提出的关学概念,林乐昌则消解了统一的关学概念,提出从时间、空间和学传三重维度对关中学人进行综合说明。详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45页;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6~207页;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10~48页;刘学智《儒道哲学阐释》,中华书局,2002年,第280~281页;林乐昌《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

^② 赵馥洁《论关学的基本精神》,《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一、关学别派还是河东别派？——从三原学派的定位看明代关学的多元发展

《明儒学案·三原学案》载“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①此句中的关学应该加上时间限定，即明代关学，特指以薛敬之、吕柟为代表的关中学者与薛瑄的师承关系，《学案》列吕柟入“河东学案”即此意。歧解在于，“三原又其别派也”句中，“其”字是指上句中的“关学”，亦或是指“薛氏”？即应把三原学派理解为“关学别派”，还是薛瑄创派的河东之学的别派？其深层含义在于，黄宗羲如何看待明代关学的发展及其构成？检遍《明儒学案》，除上条按语提到“关学”外，在《师说·周小泉蕙》中有“是时关中之学，皆自河东派来，而一变至道”^②之语，《师说·吕泾野柟》则提到“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③上句的“关中之学”显然仅是从地域范畴讨论；而下句的“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则是从学理意义上对该学派特质的归纳。

若从吕柟对于明代关学集大成相对的意义上来判定“三原学派”为“关学别派”，问题又有两分。其一，从思想的纯度说，“别派”与“正宗”相对。其二，思想的广度、影响力，“别派”与“主流”相对。从思想纯度理解，黄宗羲把是否“躬行礼教”当做判定关学正宗与别派的标准；或是从思想的广度和影响力来说，黄宗羲认定吕柟之学既是明代关学之集大成，又是明代关学的主流派别，相对的，三原学派则为支流“别派”。吕柟是明代关学的标志性人物，“时先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④影响力毋庸置疑。但其与三原学派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否就是“主流”与“别派”的关系呢？三原学派是否又具有“躬行礼教”的关学特征呢？我们应从更多相关资料中寻求答案。

《泾野子内篇》载“昔弘治间，与马谿田四五友在太学，或共屋读书，或一寺习礼，或面规其过，或阴让其善，或问学于舜颜，或求法于祖宗，或论世于千古。”^⑤这一情节是指弘治十三年至十四年吕柟与马理、崔铣等人游学京师太学，互相切磋论道，不断促成各自思想体系建构的过程，在二人文集中也保留

有书信及问学往来等资料。冯从吾则称“光禄与宗伯、司马金石相宣，钧天并奏”。^⑥马理比吕柟年长五岁，就当时影响来说，二人不分伯仲，时称“马、吕之经学，皆天下士也。”若从三原学派的开创者王恕、王承裕父子说，王恕（1416—1508年）为五朝元老，王承裕亦官至南户部尚书，二人著书立说，开办书院，弟子甚众。以弘治七年（公元1494）创办弘道书院为标志，三原学派形成。而吕柟直至王恕去世之年（公元1508年）才状元及第。可见，在前吕柟时期，关学以王恕为代表的三原学派为主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愿学编》称“关中之学，大抵源出河东、三原”，^⑦较为公允地表明了河东与三原是明代关学两个不同的源流。随着马理与吕柟的思想不断成熟，两人切磋问学，共同成为时人楷模，其关系也绝非“主”与“别”的关系。至阳明心学影响不断扩大，“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⑧吕柟逐渐声名鹊起，成为与阳明、甘泉遥相呼应的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在此意义上，黄宗羲固然强调吕柟对于明代关学的集大成意义，但因缺少了对前吕柟时期的充分展开与把握，作为“正宗”或“主流”相对意义上的“关学别派”不能合理解释三原学派的历史地位。^⑨

①②③④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8、4、11、11页。

⑤ [明]吕柟撰，赵瑞民点校《泾野子内篇》，中华书局，1992年，第48页。

⑥ [明]冯从吾撰，陈俊民点校《关学编》（附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⑦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810页下。

⑧ [清]张廷玉等《明史·吕柟传》，中华书局，1984年，第7244页。

⑨ 有学者将明代关学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三原学派为第一个阶段，薛敬之、吕柟、南大吉为第二阶段，冯从吾为第三个阶段（参见刘学智《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又见张琴霞《论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此分法打破了门户之见，依据每位学者的学理特征将明代关学通盘考虑，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这种简单的阶段划分容易导致时间的混乱，如马理（1474—1556）是三原学派的代表，吕柟（1479—1542）、南大吉（1487—1541）比马理均早20余年而亡，其学术活动与马理基本同时。考虑到马理的学术代表作《周易赞义》完成于晚年，即比吕、南去世晚20年左右，若依据三阶段划分，会造成马理早于吕、南的不准确印象。



若以“河东别派”理解则不会牵出前论若干问题。“三原又其别派也”意指,由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创的三原学派从师承上说与河东之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三原诸儒对河东之学持认同态度,或者说学理上具有某些共通性,故以“别派”称之。^①例如,王恕对薛瑄弟子张鼎极为赞赏,认为其得到了薛瑄真传,称其“理学传自文清公,高名可并太华峰”,但王恕对薛瑄与张鼎则没有师承关系。黄宗羲“是时关中之学,皆自河东派来,而一变至道”所要表达的也正是指张鼎、段坚—周小泉—薛敬之—吕柟一系的关陇学者直承薛瑄之学。可以认为,薛瑄河东之学代表了明初理学的主流方向,其对之后理学发展走向的影响是普遍意义的。而从更加广泛的视阈讲,包括河东之学、关中之学在内的明代理学,都是在朱子学的背景下发展壮大。三原学派之“河东别派”说的意义也在于此。

上文实已表征了明代关学多元发展的重要特征,其构成包括王氏父子创派,马理、杨爵等人继其大端的三原学派,吕柟得薛瑄正宗的河东之学,南大吉传于关中的阳明学,以及冯从吾提倡的甘泉学。在吕柟以前,明代关学应以三原为最盛。至吕柟起,以吕、马、南为代表的关中学者学问上相互切磋精进,气象上相互影响熏陶,既各取所长,又能保持独立的思考,^②明代关学在这种多元发展的特征中逐步展开。

二、尊朱子还是判阳明?——从马理对朱王的态度看明代关学的会通特征

1. 马理对朱子学的态度

从朱元璋制定以程朱之学治经取士的基本国策,至朱棣颁行《性理大全》,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逐渐确定稳固下来。在此背景下,马理虽对朱子学既保持高度认可,但又敢于对朱子某些理论给予怀疑,并给出不同观点。在写给罗钦顺的书信中,马理认为程朱之学接续孔孟道统,力辟佛老异端,其功千古不灭,不可轻易议论,但同时也承认“夫程朱释经之言,自今观之,千百言中似亦有一二误处”。^③

我们试举一例。在解《周易》“需”卦第四爻的过程中,马理与朱子之间产生了根本分歧。“需己

及坎切近于五,是当时任事之臣,非需郊需沙、避世避地者论也,故宜无所退避,直需杀伤之地,……沧源固守程朱柔退之说,未之信也。”^④马理认为,他对于六四一爻的理解颇能发挥先贤未尽之意。依据各爻之间的关系,四爻切近于五爻,五爻为至尊之君位,则四爻之臣应当勇往直前,临危受命,“文死谏,武死战”,这正是杀身成仁、“忘身殉国”之时,天理昭昭如此。四爻臣位“有官守言责之寄无所逃焉者也,故有需于血之象。”职责所在,无所逃避,只可“见危受命以平难而为心矣。”而其转危为安之机则在于“济其君而显其身矣,能不出自坎穴也耶?”^⑤

而朱子解易对此爻的解读主柔退,马理认为并不可信。我们来看朱子的理解“四爻坎体,入乎险矣,故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进,故又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则虽在伤地而终得出也。”^⑥需卦上坎下乾,四爻已入坎体,低陷难测,入于险境之中。“需于血”者,极危险之象。而六四主柔,需而不进,故而又可“出自穴”,有出路可逃。朱子认为,占者只要能够把握主“柔退”“不进”的原则,虽然身处危险之地却最终可以转危为安。可以看出,朱子主要通过对爻位的阴阳性质对需卦六四一爻给予了主柔退的论证,而马理则依据爻位间关系及其意象对该爻给予了完全相反的说明,二者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该爻作出了圆融的解释。

以上讨论说明,马理虽然从总体上对朱子学表现出拳拳服膺的态度,对其道统地位及意义充分肯认,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思考与理解,如对《易》的

① [明]冯从吾撰,陈俊民点校《关学编》(附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32页。

② 这一点可从马理对阳明的态度看出。马理对阳明基本上是批评的(详见下文),但对作为阳明弟子与关中同乡的南大吉多所肯定,对南氏以礼化民的实践活动中取得的成就表示赞扬。参见[明]马理《明故中顺大夫浙江绍兴府之父瑞泉南先生墓表》,《谿田文集搜遗》卷1,清惜阴轩丛刊。

③ [明]马理《上罗整庵先生书》,《谿田文集》卷4,明万历十七年清乾隆十七年补修本。

④ [明]马理《寄河南巡抚古川葛中丞书》,《谿田文集》卷4,明万历十七年清乾隆十七年补修本。

⑤ [明]马理《周易赞义·需·卦辞》,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綱刻本影印。

⑥ [宋]朱熹《朱子全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解读中,表现出独立思考,并对朱子观点作出修正。这是其对朱子学的基本立场,也体现了理性崇实的关学精神。

2. 马理对阳明学的态度

在心性认知问题的讨论中,马理通过区分几种不同类型的“知”,确定了心性主体在不同层次阶段的修养工夫论内容。“夫良知者,即孩提之童,良心所发,不虑而知者也,与夫隐微之独知异矣,与夫格致之后至知则又异矣。”^①所谓良知,是指孩提之童良心所发,是不通过思虑而获得的知。这区别于隐微之独知,即通过慎独、涵养等个人的体验活动获得的知。而格致之知则明显带有程朱一系的认识论特征,即通过格物穷理的不断积累,以期豁然贯通的全体大知。其中,前两者属于道德认知,而格致之知则属于理性的经验认知。据此,马理批评某些错误的倾向“其师曰‘此知即彼知也。’又以中途有悟,如梦斯觉为言,此真曹溪余裔。”^②这就是说,把孩童之先天良知与隐微之知、格致后之知混为一谈,试图通过“悟”来求知,这种神秘而无稽的体验,是佛教异端的支流余裔。马理虽未点名,却非常明显地指向了阳明末流空谈道德性命之说的倾向。

薛应旂(1500-1575年),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对马理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马理墓志铭即为薛氏所作。二人对阳明之学有过争论,马理认为,过去杨墨之学充塞大道,孟子力辟其非。当今又有大放厥词者,认为圣人可当下学得,不必读书,肆意妄为,其危害已经超过了杨墨,“实自王伯安倡之也!子其谓何?”^③薛氏答道“此末流之弊也,岂伯安之罪哉?”^④认为这只是心学末流的弊端,不能就此怪罪阳明本人。

事实上,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并非着力于玄思冥想,而正在于事上磨炼。他说“只去玄空想个本体,不过养成一个虚寂。”^⑤如果不在良知上实实在在地下为善去恶的工夫,只是空想一个虚寂的良知本体,实际毫无用处,这一弊病阳明实际很早就已经看到。作为阳明高足兼良友的邹东廓也与马理有交,他认为马理对阳明之学只是道听途说,多有误解,并赠诗^⑥马理,劝其应当以身体验其学,把握其

“牛首”“山巅”。

马理力图指出阳明思想中可能具有的极端倾向来维护理学的纯正,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二人关于心性修养工夫的讨论又具有很强的一致性。马理以“纯一”“童蒙之知”描述未与物交的先天之心,这实际上与阳明描述的明莹无滞^⑦的心体状态是一致的。《孟子》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之语,程颢、吕大临等理学家都曾对此作出细致描述,对待此一先天未发之心最简易直截的方法使“因其纯而养之”,这一点成为理学家的共识。其区别在于,马理更加重视通过格致的工夫恢复心的纯净状态,其实质是对小程“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说的进一步发挥。而王阳明通过对心体四有四无的讨论,提出了兼顾钝根之人和利根之人的不同修养方法。以“四句教”为标志,阳明代表了明代心性论的新阶段。马理虽然仍以格物穷理为工夫修养的基本内容,但他对存养童蒙之心的重视,对隐微独知的工夫讨论表明,马理已十分注重内向的修养工夫,其思想与阳明学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展现出“会通朱王”的特征。

有学者指出,“和会朱陆”已是明初以来理学的重要特点,三原学者禀承了这一特点,会通各家思想,如王恕即对朱熹《四书集注》提出了许多怀疑与批评。^⑧赵馥洁亦指出“明代中叶,关学中兴,……他们多受其他学派特别是受朱熹、王阳明之学的影响,既守关学的宗旨,又蕴含各家之长。”^⑨可见,

①② [明]马理《上罗整庵先生书》,《谿田文集》卷4,明万历十七年清乾隆十七年补修本。

③④ [明]薛应旂《薛子庸语》卷6,明隆庆刻本。

⑤ [明]王阳明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⑥ 诗曰“君未登牛首,还知牛首未?传闻非自得,悬料终疑似。何如陟其巅,万象无遁视。归去大华山,轻举时自试。”见[明]邹守益《邹守益集·赠马伯循西归》,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144页。

⑦ “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姑且教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见《王阳明全集》(上),第133页。

⑧ 朱晓红等《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⑨ 赵馥洁《论关学的基本精神》,《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马理思想中所体现的“会通朱王”的特征既是三原学派的共同倾向,又代表了明代关学思想发展的一般特征。

三、复归还是超越?——从马理之学看明代关学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发展

陈俊民把关学的历史发展纳入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辩证法,^①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明代关学对于北宋关学具有的超越意义。但问题在于,明代关学呈现出多元展开的特征,其复杂状况不能作依于北宋关学而又超越北宋关学的简单理解,正如林乐昌所说,纳入正反合逻辑圆圈的关学历史“与关学演化的实际进程很难吻合。”^②林进而提出应进行具体分析,分别从时间、空间和学传三重维度进行说明。本文认同此说,马理之学与张载之学的关系应做具体分析。

王承裕曾经致书马理诸弟子,提到对张载关学无传的无奈与担忧,并认为张氏后裔不兴旺是关学不传的重要原因。“夫横渠之学昭昭也,……诸子尝从予究心横渠之学,……且及各能用实力、务正学,不以一时荣利动其中,吾道有光矣。”^③可见,三原学者对关学宗师张载的重视不仅是地域情感因素的影响,而是真正认为其有序有统,昭昭自明,是道学正途,并坚信致力于横渠之学可以光复道统。马理对张载之学的继承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本体之思考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张载提出了“太虚即气”的著名命题。“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④张载强调虚与气的统一不可分的关系,气聚而为万物,气散为太虚。太虚是气的本然存在,而虚与气的关系又不是生与被生的关系,统一而不可分的虚气构成了自然万物,如果理解了虚与气的“即”的关系,聚散、出入、形不形的万物生化之理就能推本溯源,深于易道,也就不会流于佛老的有生于无之论。

马理在解大畜卦时提到“乾内而艮外,则天

在山中,山包天之外矣。盖太虚即天,凡山中地上虚而通气者即天。”^⑤按大畜卦象,下乾上艮,是山中有天之象。马理认为,太虚就是指天,而天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山中地上,这是就卦象而言;其二,虚,这是本体义的必然要求;其三,通气,即阴阳二气,这是化生万物、形下落实的要求。马理对天“虚而通气”的界定,其意义不仅在于看到了万物的“虚”与“气”二层特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张载“太虚即气”的本体论思想被二程误解与批评,张载之后鲜有坚持,马理则继承了这一理论思考,并在解易中得到实践发展。

李存山认为,“观《易》必由《系辞》”是张载诠释《周易》的突出特点,而对《系辞》的一个重要认识即“先识造化”。^⑥“易,造化也。圣人之意莫先乎要识造化,既识造化然后其理可穷。”^⑦张载认为,易就是造化,观易就是要先识造化之理,因之悟解天道性命之理,而造化就是一阴一阳的变化之道。在此基础上,马理进一步提出了“易即造化,造化即易”^⑧的命题。一方面,马理顺承张载之说,肯定造化之道体现在易中。“易之道,尽于造化而见之矣,观易者观于造化可也。”^⑨相对的,从用易的层面,马理提出了“造化即易”。“造化之道,一阴一阳而已矣。”^⑩易既然是天道的体现,那么也应当将易道运用到社会生活中,“阳唱而阴随,造化之利也;夫唱而妇随,人道之利也。”^⑪

① 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与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30页。

② 林乐昌《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

③ [明]王承裕《与门人书》,《王康僖公文集》卷1,清刻本。

④⑦ [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7~8、206页。

⑤ [明]马理《周易赞义·大畜·象辞》,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

⑥ 李存山《“先识造化”——张载的气本论哲学》,《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

⑧⑨ [明]马理《周易赞义·系辞上》,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

⑩ [明]马理《周易赞义·益·彖辞》,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

⑪ [明]马理《周易赞义·归妹·彖辞》,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



2. 礼学之实践

黄宗羲“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判断由来已久,小程总结张载教法为“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①这一说法后来逐步演变为“以礼为教”,以之作为关学的突出特征。马理接过了张载“以礼为教”的大旗,刊刻《蓝田吕氏相约》,以礼化民,身先士卒,时称“其执礼如横渠”。

马理有着系统的礼学思想体系。^②他确立了礼源于天的理论基础,秉持类族辨物的制礼原则,落实于修身成德、社会教化与固国安民的礼之大用。马理认为,修养工夫、社会教化以及固国安民均以礼的重要参与为实现条件,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递进关系。“家人风化,本于家人。”^③马理认为,家庭风气教化是否健康,女子贞正至关重要。女德贞正,夫妇和谐,进而父子兄弟关系确立,君臣关系稳定。“天下之礼皆从此出,风化由此而成,女贞之道大矣哉!”这就意味着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不仅在个人修养上具有意义,而且在社会教化及政治统治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天秩之礼落实为人间秩序,一方面体现在个人成德的修养工夫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礼法制度,二者均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影响,这在家庭关系中有集中体现。马理认为,家人是风化之本,“君子观象,知齐家为风化之原,又知修身为齐家之本,又知言行修身之要。”^④《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的德目要求在此成为解释《易》“家人”卦的依据。而无论修身以成德,还是齐家而风化成,其最终指向都应该是国固民安,天下太平。

“大礼议”是嘉靖朝著名的政治事件,涉及人数众多,影响力巨大,《明史》《明实录》对此均有详细记载。马理直接参与此次事件,对躬行礼教的践履精神及崇尚气节的关学品质做出了生动诠释。“嘉靖初,(马理)起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等伏阙争大礼。下诏狱,再予杖,夺俸。”^⑤嘉靖即位后,围绕嘉靖帝生父是否应追封谥号、立庙从祀的问题,君臣之间展开激烈争论。多数官员以不符礼制为由反对追谥,嘉靖帝固执己见,把邹守益、杨慎、丰熙等一众谏臣廷杖、夺俸、下狱。《明

世宗实录》载“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官姑令待罪。”^⑥嘉靖以其皇权地位取得了这场大论战的胜利,但是马理诸臣表现出不畏皇权的傲骨气节,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无限膨胀的君权,事件发生后不久,嘉靖便下旨对在事件中受牵连的众臣复官复俸。值得一提的是,马理弘道书院同窗,同中正德九年进士的张原治才卓越,“以议大礼撼门哭,再被杖,创重卒。”^⑦弘道书院同窗、正德癸未进士雒昂官至河南巡抚,期间因弹劾徽藩“被逮廷杖,毙阙下。”^⑧关中士人气节之厚可见一斑。

马理与吕柟还曾围绕礼的经权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⑨这理应成为明代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因大礼议而受廷杖之责的三原马理诸儒既表现出关中士人厚重的性格与不屈的气节,同时又是对张载“躬行礼教”关学思想特征的最好诠释。

3. 事功之学

马理特重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之学,他面对当时弊,敢于直言直谏,青史留名;而且著书立说,讲学不辍,以身体道;对科学考察尤为重视,主持编纂《陕西通志》,为了解陕西地区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马理一生诲人不倦,早年在弘道书院求学期间就已代师授课,京师游学期间更在宝庆寺讲学

① [宋]程颢等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3页。

② 许宁等《马理礼学思想简论》,《唐都学刊》2013年第2期。

③ [明]马理《周易赞义·家人·卦辞》,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

④ [明]马理《周易赞义·家人·象辞》,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郑纲刻本影印。

⑤⑦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4109、2791页。

⑥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41,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微卷景印,第1050页。

⑧ [明]朱昱修:《嘉靖重修三原志》卷16,明嘉靖十四年刻本。

⑨ 详见《与吕泾野书》,《谿田文集》卷4,明万历十七年清乾隆十七年补修本。



论道,后授书于嵯峨书院,晚年则讲学于商山书院。在《刻周易赞义序》中,马理对作《易》的原因给予说明“《易》为六籍之原也,今者不作,二三子何观焉?”其对《易》书作注的目的就是为弟子学习六经之书提供借鉴参考。据载,马理门人弟子众多,且多能领会并承传核心义理。有人对当时盛况作出形象描绘“三原马子伯循,诵先王之法,希圣贤之轨,典刑所昭,风声斯被。”^①他以教化成人、成德为目标,带领弟子读史诵经,推演礼法;众弟子进则肃敬有加,站则恭敬有礼,退则整齐有序,传为美谈。

《陕西通志》一书由时任陕西巡抚赵廷瑞发起撰修,马理与吕柟共同主持编纂,但因吕柟早亡,该志大部分内容由马理独立主持完成。邵国秀将成化《陕西志》、嘉靖《雍大记》与该志比较,认为《陕西通志》“无论体例之严谨,或记事之详确,远在前二志之上”。^②全书分四十卷,列土地、文献、民物、政事四纲,下含疆域、兵防、经籍、名宦等二十八目,约一百九十万字,对明代及以前陕甘二省史料给予了整理保存,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马理通过观察星象、考察典籍、体察义理以及文献互参互证的科学方法,对迷而未明、未辨的信息给予准确论断,对其错误之处给予纠正。他说“观象考籍,得兹土星文,当列宿之半,五行之二,云汉之全,复屡得秦星所在。又察理考籍,得天下山川脉之所起,源之所发,为纪为络,为条为列,分江分河,要会之处。又参互考订,得名山大川所在。昔所迷者,皆辨而著之。……史既舛谬,志益踵讹,悉加正焉。”^③该志还收集绘制地理、城池、物产图二百余幅,全面展示陕甘人文自然风貌。马理还曾对当时先进的武器装备进行考察说明,^④兹不再赘。马理事功之学是对张载敦本尚实、经世致用关学学风的有力继承。

四、结语

明代关学蓬勃发展,是明代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陈俊民所言,从北宋张载至清初李颀,“这均是理学思潮在关中表现的具体形态。总之,他们也同其他理学学派一样,把‘危微精一’‘格物

穷理’‘理气心性’‘戒惧慎独’等等作为经常讨论的题目。”^⑤明代关学的发展也符合明代理学发展的一般特征。

明代关学又不失自己的学术特色,它在朱子官学的背景下对其保持理性认识,又与新兴的阳明学保持学术争论,体现出会通的特征。其对于张载之学,既不能简单理解为复归,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地域感情因素影响下的精神传承,从而流向对张载之学继承方式认识的泛化,而是对张载之学有了新的体认和发展,如马理对太虚的理解与对易的认识,对礼的讨论及实践活动,对气节之厚的生动诠释,重实重行的事功之学等等,均体现出关学的品质内涵。至于自张载始的“自立说以明性”^⑥从而“勇于造道”^⑦的精神,三原学派的创立即是最好的说明。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无 语

① [明]唐龙《嵯峨精舍记》,《渔石集》卷1,明嘉靖刻本。

② 邵国秀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序),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1页。

③ [明]马理《陕西通志序》,《谿田文集》卷2,明万历十七年清乾隆十七年补修本。

④ 详见《圣天子设险除器以靖中夏记》,《谿田文集》卷3,明万历十七年清乾隆十七年补修本。

⑤ 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与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⑥ [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275页。

⑦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662页。

